

英雄唱着马赛曲为她送葬

1871年 4月 18日，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在巴黎公社和梯也尔反动武装浴血奋战的 100天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妇女在战火中来回奔忙。她就是巴黎公社著名女战士、小学教师路易丝·米歇尔。

1871年 5月 19日，巴黎公社的女战士路易丝·米歇尔在马赛逝世。她的学生们唱着《马赛曲》为她送葬，在她的墓旁开满了红石竹花。

1871年 5月 19日，路易丝出生在法国东北部丘陵区的弗龙古。长大成人后，她在农村当小学教师。由于她一直不肯宣誓效忠于帝制，所以她只能在私立小学教书。后来，她为了寻求和她有同样共和思想的人，一个人来到巴黎，一边教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她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投入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她的献身精神鼓舞了革命战友，也震惊了敌人。敌人骂她是“妖婆”、“魔鬼”。对于敌人的咒骂，她一点也不在乎。在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的最后一周，她幸免于难。敌人没有抓到她，便把她的母亲抓了起来。路易丝一生只对一个人充满柔情，那就是她的母亲。为了援救落入敌人魔掌的母亲，她不惜身陷罗网。

敌人抓到了“妖婆”，立即开庭审讯。路易丝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侃侃而谈。这个革命女战士早已将生死置之度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外,她的许多同志都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巴黎被淹没在血泊中,生命对于她来说就是用来战斗的。她最后说:“我说完了。你们判我死刑吧,如果你们有胆量!”梯也尔政府知道路易丝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害怕一旦判她死刑,可能会引起公愤。于是,法庭判处路易丝无期徒刑,流放到海外的荒岛上,终身服苦役。

路易丝告别了老母,离开了法国。她在一座荒岛上度过 19 年苦役犯的非人生活后,在 1870 年的大赦之后回到法国。虽然她已经是一个 36 岁的老人了,但斗争意志仍不减当年。她一边投身于工人运动,一边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她被多次投进监狱,受尽折磨。然而她每次出来后,还是照样干革命,令统治者大为头疼。

路易丝面对敌人的摧残,发表了许多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作品。主要有《元旦之书》、《穷困》、《被蔑视的人们》、《像病菌一样的人》、《回忆录》、《时代的罪行》、《平民的女儿》、《公社历史和回忆》等。最后一部作品是她在 72 岁高龄时写的,在书中她满怀深情地回忆起那过去的战斗岁月,缅怀那些牺牲的同志,赞颂公社精神是永存的。

人们至今还可以从她的《红石竹花》诗中感受到她的斗争精神,诗中写道:“如果我被送到阴暗的墓地,兄弟们。请向你的姊妹抛掷几朵盛开的红石竹花,表示一点最后的希望。”

红石竹花,正是这位不屈的女斗士一生生动的写照。

1919 “东游运动”

越南维新会成立后，决定向日本求援和学习。1919年1月10日，潘佩珠和曾拔虎离国，假道香港、上海，于源月下旬到达横滨。去东方日本留学的“东游运动”，便从此开始。在横滨，潘佩珠会见了神交已久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梁启超。梁启超对潘氏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他认为要完成救国事业必须有实力，必须开启民智，提高民气和培养人材；至于军队、粮饷、器械，应向两广求援。他反对潘氏争取日本出兵援越的设想，指出一旦日军进驻越南，势必不肯撤出，其结果“是欲图存而益以促其亡也”。他鼓励潘氏积极作好抗法起事的准备，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梁启超还介绍潘氏结识日本政治家、前首相大隈重信和进步党总裁犬养毅等人。他们认为要日本派兵援越不大可能，建议潘氏应鼓励越南青年来日留学，培养人材，并愿协助接待。通过这些接触，潘佩珠认识到请求日本派兵援越的计划不切合实际，于是把工作转向组织越南青年赴日留学方面。

潘佩珠接受梁启超的建议，撰写了《越南亡国史》一书，由梁启超代为润色帮助出版。这本揭露法国帝国主义暴行的著作，曾经激发了无数越南人的爱国激情，影响很大。正是在中国改良派的影响下，潘佩珠在政治上走上了谋求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道路。他说：“依吾国古来之历史与现在之民智，则君主为宜。吾党所以谋拥皇亲圻外侯，亦君主之预备也。”

1919年7月初，潘佩珠回国，组织青年赴日，同时为疆抵出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国作准备。他和他的同志极力鼓动在国内各地组织工会、农会、商会和学堂,借助这些团体团结人民的力量,开发民智,并把它们作为迎送和资助留学生的秘密机关。他在国内仅停留了员个月,于苑月底又回到横滨。由于富家子弟不愿离乡背井,穷人无钱出国,潘佩珠此行只带来猿个留学生。针对这种情况,梁启超建议潘氏写了《劝国民资助游学文》,号召国内人士资助游学。

员圆年,经犬养毅介绍,潘佩珠在横滨会见了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后来,他们就中国和越南革命问题进行了两次长的笔谈。在革命方法方面,双方都主张武装暴动。但对革命的目的则存在分歧:孙中山主张铲除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潘佩珠则主张越南独立后建立君主立宪制,不能立即实现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希望中越革命力量进行合作,待中国革命成功后,再援助越南等弱小民族取得独立,潘氏则主张中国革命党先援助越南取得独立,然后以越南为根据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尽管双方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他们的会见为以后两国革命力量的相互支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与孙中山会晤后,同年潘佩珠赴香港迎接疆抵到广州(员圆年员月疆抵到达日本,入振武学堂学习)。他们在黑旗军抗法名将刘永福的家里召开会议,正式把员圆年成立的组织命名为维新会,制定章程,提出该会议以“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国”为政治纲领。在这以后,潘氏撰写《敬告全国父老书》(以疆抵名义起草)和《海外血泪书》、《续海外血泪书》,继续号召国人起来抗法。其中《海外血泪书》是一篇重要的文告,可以视为维新会的政治宣言。但是潘氏在书中所宣扬的仍然是已变为保皇党人的梁启超的思想,认为越南亡国的原因,是“皇帝不知有民,国家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家”。他主张团结的社会阶层,也大多属于封建阶级,而忽视农民的作用。

同在 1895 年,越南士大夫中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潘周桢也到日本考察,并会见了潘佩珠。此时,两人在政见上已发生了分歧:潘佩珠主张暴力反法,拥护君主,而潘周桢则反对暴动,提出“倚法求进步”,主张打倒贪官污吏,废黜昏君,提倡民主。虽然维新会从总的方面看是一个改良主义组织,但是潘佩珠和潘周桢却分别代表了其内部主张暴力手段和平手段两种不同的倾向。潘佩珠是封建勤王运动的继承者,还没有完全脱离尊君保皇思想的窠臼,他的主张偏重于反帝;潘周桢则更多地反映了立足未定的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偏重于反封建。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密不可分的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两个人的主张都有其片面性,特别是潘周桢不强调反帝,忽略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更是错误和有害的。幸好当时这两种倾向尚未造成维新会的分裂,他们对出洋东游的意见还是一致的。潘周桢在日本作了短时间的考察后,便返回越南。

1895 年 5 月,潘佩珠再度回国。他在繁昌与农民起义军领袖黄花探的会谈取得了重大成果。黄花探表示愿意加入维新会并收容从中圻来的爱国志士,当中圻起义时将举兵响应。潘佩珠则保证,一旦黄花探需要支持,他就在各地发动起义进行策应。

潘佩珠此行,促进了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到 1896 年,各地普遍建立了商会。河内创办了“东京义塾”和它的地方分校。与此同时,响应潘氏号召赴日留学的青年愈来愈多,他们先后入振武学堂和同文书院学习军事、政治。同年,潘佩珠组织了公会,分设经济、纪律、交际、文书源部,处理留学生事务。

1897 年以后,潘佩珠考虑到越南与中国的云南、广西毗连,将来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并假道返越,因此加强了与《云南》杂志负责人赵珍斋联系,并任该杂志编辑,还在该杂志上发表了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越亡惨状》、《哀越悼滇》等许多文章。由于同中国革命党人的不断接触,使他加深了对民主思想的了解,促使他向赞成民主共和政体的方向转变。他曾回忆说:“余因多与中国革命党人相周旋,民主之思想日益浓厚,虽阻于原有之计划,未能大肆其词,然胸中含有一番改弦易辙之动机,则自此始。”到 1905 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便抛弃了君主立宪主张,提出“民主主义议案”,从改良主义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潘佩珠在日本,还进行了广泛的活动,促成中国、朝鲜、印度、菲律宾等国革命者团结反帝的“东亚同盟会”成立(1905 年),并与云南、广西两省的留学生组成了“桂滇越联盟会”。

从 1903 年—1905 年间,潘佩珠不辞劳苦,往返于越南、香港、广州和日本之间,宣传和发动革命,发起和组织了东游运动。到 1905 年 1 月初,越南留日学生人数已达 1000 人(其中南圻 100 余名、中圻 200 名、北圻 100 余名),且第一批留学生已从振武学堂毕业。

对此,法国殖民当局十分恐惧,便于 1905 年开始镇压东游运动。一方面在越南迫害留学生家长;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提出解散旅日越南留学生组织的要求。1905 年夏,潘佩珠派回西贡提取南圻义民资助游学的 100 万捐款的人,为法国密探逮捕,暴露了游学的机关。法国殖民者借此迫害有关人士,割断国内与留学生联系的渠道,断绝经济接济。由于留学生纷纷接到家书,害怕家属受连累,被迫要求回国。同时,从来就不支持越南革命派反法的日本政府又接受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要求,于 1905 年 12 月下令解散了公宪会和同文书院,并驱逐越南留学生出境。1905 年 12 月,疆柢和潘佩珠被驱逐出日本,缺乏广泛群众基础的东游运动遂告瓦解。

这样,在越南历史上持续 3 年之久的东游运动宣告失败。

1905年 “流血星期日”

1905年，在沙皇政府的许可下，格·加邦牧师组织了“彼得堡工厂工人大会”，并在各个大企业设立分会，企图通过合法的途径改善工人的处境。这样，加邦在一些政治上不够觉悟的群众中颇有影响。加邦的活动在当时已引起布尔什维克的注意，他被怀疑是一个奸细。列宁认为不能绝对排除加邦“可能是真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对加邦的了解“只有不断发展的历史事件，只有事实才能解决”。

1905年1月19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厂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压迫，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工资额、废除强制的加班加点，举行了罢工。到20日，参加罢工者达15万人。加邦决定组织工人向沙皇递交请愿书。就在工人准备去冬宫的时候，沙皇政府策划着一场血腥的大屠杀。

布尔什维克及时地向工人提出警告。1月20日，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散发传单，提出了“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指出“解放工人只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既不能从牧师那里，也不能从沙皇那里等待自由”。虽然布尔什维克极力劝阻工人去向沙皇请愿，但由于大多数工人对沙皇抱有幻想，未能摆脱加邦的影响，请愿还是照样举行。

1905年1月20日，还在雾茫茫的早晨，彼得堡街头就聚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身着节日的盛装，精神焕发。工人和他们家属的队伍，大约10万人，按照加邦的计划在10个地点列队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站立,然后跟着三色旗、圣像、沙皇肖像的后面,唱着祷告,向冬宫行进。加邦领着队伍最大的纳尔瓦工人,手里捧着成千上万人签字的、准备向沙皇呈递的请愿书。请愿书写道:“皇上!我们,圣彼得堡城各等级的工人和居民,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无依无靠的老人——我们的双亲,到你——皇上这里来乞求公道和保护。我们贫困、备受压迫,我们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劳动负担,我们被人辱骂,不把我们当人,对待我们如同对待应当忍受自己的苦命而默不作声的奴隶一样。我们都忍受了,但是我们更被推进赤贫、无权和愚昧的深渊,专制和恣肆压抑着我们……我们的忍耐达到极限了。对我们来说,一个可怕的时刻来到了:死倒比继续忍受难堪的痛苦更好。”接着,请愿书陈述了人民的经济、政治要求,包括实行愿小时工作制、将土地转交人民、实行大赦、各种政治自由和召开根据普遍的、平等的、秘密投票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请愿书反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低纲领的基本要求,但总的来说,仍带有天真的模糊的色彩,以为用和平请愿的方式就可以唤起沙皇实行民主改革。

当队伍行进的时候,在所有哨所、桥梁、广场、街道都已布下戒备森严的军队。工人们还以为是在“维持秩序”,继续游行。可是,队伍到了冬宫入口处就被封锁住了。军警突然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鲜血染红了积雪的广场,死伤达源源多人。这就是有名的“流血星期日”。

员月 圆日事件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沙皇并不是他们的保护者,而是最凶恶的敌人。工人愤怒地说:“沙皇痛打了我们,我们也只好把他痛打一顿!”当天晚上,工人们开始自发地同沙皇的军警发生冲突。和工人一起参加请愿游行的布尔什维克立即动员,组织工人拿起武器,打倒沙皇专制制度。在瓦西里耶夫岛、纳尔瓦哨所等地区,工人用大车、大桶、圆木、电线杆构筑了

街垒 街垒前面张了铁丝网。工人袭击了武器工厂、武器商店、警察据点,夺取了大量武器。瓦西里耶夫岛的工人还占据了一个印刷所,并印发了这里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号召工人进行武装斗争的传单。

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是“流血星期日”的目击者。他不但记录了大量的沙皇制度镇压人民的罪证,而且连忙写了激励人民起来同沙皇制度进行坚决斗争的呼吁书,可惜这份呼吁书的手稿被警察搜获。沙皇政府对高尔基的革命行动十分仇恨,立即把他逮捕起来。

当时列宁正在日内瓦。在获悉 1月 9日事件后,列宁就给以充分的估计,并敏锐地指出整个革命发展的趋势和远景。他在为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写的《俄国革命的开始》一文中说:“工人阶级从国内战争中得到了巨大教训,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里几个月几年都不能受到的”,“我国工人阶级已英勇开始的推翻俄国沙皇制度的事业,将是世界各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流血星期日”极大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消息传出后,全国规模的罢工迅速扩大。据官方统计,在 1月 9日以后的 1个月内,罢工人数超过 100万。在彼得堡,1月 9日没有一个人上班,以后几天,罢工才逐渐减少。到 1月 10日早晨,一些工厂的工人才逐渐复工。普梯洛夫等几个大的工厂到 1月份还继续罢工。1月 10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向工人发出了抗议专制制度的新罪行、支援彼得堡同志的号召,在短期内有 1000个工厂、约 100万左右工人罢工。运动从莫斯科很快扩展到整个中央工业区。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图拉、尼日涅—诺夫哥罗德、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尔,罢工斗争都是直接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进行。群众性的罢工运动进一步波及到乌拉尔、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一带。在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罢工运动猛烈发展,且常常发生工人和警察的流血冲突。

在工人罢工斗争的影响下,广大农民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们从分散的暴动发展为反对地主的群众性的起义。在奥尔洛夫、库尔斯克、契尔尼哥夫,农民大规模烧毁地主的庄园。从1905年12月以前,农民运动已经在俄国1/3的县份展开。

这样,以“流血星期日”为标志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了。

源俄军屡战屡败

旅顺陷落和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被歼,使日本获得完全的制海权。但是,俄军在沈阳还集结了猿万人,源门大炮。日本决定乘胜发动沈阳会战,以全歼东北俄军。缘年圆月中旬,日本调集了源万兵力,源门大炮,向沈阳发起进攻。虽然俄军兵力占优势,但由于俄军计划和部署不当,指挥错误,行动缓慢,战斗一开始就失去了主动权。

圆月下旬,大山严命令第缘军进攻抚顺,从背面对沈阳俄军实行迂回包围。库罗巴特金误以为是日军主力,急忙调预备队迎战,结果日军第员军趁机渡沙河北上,与第缘军联合作战。与此同时,日第源军、第圆军从正面展开攻势,苦战源日,未分胜负。这时,日第猿军在乃木希典的指挥下,从洋河和辽阳间迂回北上,占了新民屯,绕到俄军后方。库罗巴特金又将预备队调回,造成了混乱。日第猿军接近沈阳市区时,库罗巴特金才发现自己身陷重围。猿月源日,他慌忙下令全军北撤,日军乘胜猛攻,一举占领沈阳,不久,又攻下铁岭,开原等地。日俄陆战遂告结束。

沈阳会战是日俄战争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战役。日军伤亡约源万,俄军死伤约猿万,被俘源万余。库罗巴特金因屡吃败仗被沙皇撤了职。

缘只有一名厨师逃脱

早在 19 世纪 90—1900 年代,川边藏区就成了西方传教士注目的热点。1892 年法国天主教士最先在达标埠(今汉源县化林坪)建立了主教府,作为教会势力伸入川康藏区的前哨阵地。接着,奥、意、德等国教士随之而入,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也接踵而来。这些传教士一方面向藏民宣传灌输基督教义,一方面通过说教挑拨汉、藏民族关系。他们还霸占土地、勾结官府,进行掠夺,成为当地最有特权的地主。法国天主教会将康定所属的榆林沟、孙家湾、磨房沟的良田五百亩据为己有,后来又把泸定所属的沈村、冷碛、磨石的土地千余亩窃为教会私产,超过当地的土司头人。法国教堂在巴塘也占地近 1000 亩。美国教会在巴塘以年租仅 100 个藏洋的价格,便强租巴塘南门外架炮顶地方 1000 亩土地,不久又扩大为 2000 多亩,而且自行规定租期为 100 年。他们视此如租界,构筑高墙大院,建以教堂,守以恶犬,不受地方政府管制,俨然成为国中之国。

从传教士进入川边藏区开始,就与千百年来“信佛深笃”的藏族人民发生了尖锐的文化信仰冲突,严重地挫伤了藏族人民的民族感情。虽然同是宗教,但许多藏民已经看出西方教廷推行的“基督教化”之目的实为吞掉佛教,所以藏族各阶层人民对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始终心存戒备和忿恨。一旦矛盾激化,自然会导致“仇教”运动。

1904 年,英军入侵西藏,与西藏相邻的川滇青诸省受到严重

威胁。清政府急忙筹划“经营”川藏边区，加紧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同年5月，清廷下令注意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今新龙县）收回内属。同时谕令四川总督锡良会同驻藏大臣有泰，帮办大臣凤全妥筹办理。凤全一到巴塘即发布谕令，限制喇嘛权力和喇嘛人数，限制开垦荒地等，并着手部署实行改土归流。这就引起了喇嘛寺庙和土司头人的不满。加之凤全对教会势力竭力保护，袒庇洋人，藏民见他所带卫兵习洋枪、用洋鼓等，便疑其为外国官员，认为他“办事悉为洋人来”，更激起了藏民的愤慨。

1894年猿月猿日。在喇嘛、土司头人的带领下，爆发了有猿千多藏民参加的武装暴动。起义军所到之处，教堂被毁，还有两名法国教士被杀。凤全及其所带清兵猿余人，几乎全部在鹦哥嘴地方被击毙，只有一名厨师逃脱，向外报信。

巴塘风潮很快波及里塘和川滇交界地区。盐井县藏民焚烧上坝天主教堂，道孚等地区也发生了“焚教堂，戏教士”的打教事件。川滇藏邻村为之震动。尽管藏族上层僧侣及土司利用了群众的反教反清情绪，但就事件本身来说，这次事件是有着鲜明的反帝反清性质的。

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打箭炉主教倪德隆向清廷川藏大员发出照会，要求赔款、惩凶。清政府慌忙道歉议结，并派四川提督马维琪、赵尔丰进剿，以致引起藏汉人民长达数年的反抗。在这起事件中，教会勒索白银九千万两，并扩大教堂占地面积九千余亩，藏、汉人民被杀数百人。

远遥摩洛哥危机

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部,西临大西洋,北靠地中海,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扼守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摩洛哥又富有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产,如锰、铝、锌、铀、石油、煤、铁,特别是铁矿蕴藏量非常丰富。因此,摩洛哥历来成为列强积极争夺的目标。

法国早就企图夺取摩洛哥,而且野心最大。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法国就逐步蚕食摩洛哥东南部靠近阿尔及利亚一带,打算从这里继续向摩洛哥内地推进。法国从 1856 年—1859 年还积极从事外交准备,首先与意大利和英国先后达成协议,两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地位。就在 1859 年 3 月 26 日签订《英法协约》后不久,同年 4 月 26 日法国又同西班牙签订了在摩洛哥划分势力范围的条约,摩洛哥北部和西南部被划为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其余的地区则划为法国势力范围。同时,西班牙同意承担不向任何强国求援的义务,意指不得同德国结盟。

在《英法协约》和《法西条约》缔结后,法国加紧推行其吞并摩洛哥的计划。当年,法国迫使摩洛哥苏丹接受 2000 万法郎的贷款,而以交出摩洛哥全国海关收入的大部分作为保证。1859 年底到 1860 年初,法国向摩洛哥苏丹提出一套进行全面“改革”的方案,其中包括建立在法国军官控制下的警察部队,成法国金融家把持下的国家银行,以及为法国托拉斯谋取修筑铁路和开采矿产的租借权。实现这一方案,无异于使摩洛哥“突尼斯

化”，即建立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权。

法国的企图遭到德国的坚决反对。德国一方面对摩洛哥怀有同样的野心，它也企图把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有重要地位的摩洛哥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建立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上霸权以及使其成为向非洲大陆进行殖民扩张的政治、军事基地；同时，还企图开采那里的丰富铁矿，以弥补国内铁矿之贫乏。另一方面，德国是为了借此打击法国，迫使法国做出让步，以削弱英法的同盟关系。

为了阻挠法国在摩洛哥所加紧实施的计划，德国决定以武力相威胁，德皇公开发表挑衅性的演说。1905年7月1日，德国宰相毕洛夫在国会宣称：摩洛哥的政治现状必须保持，德国在摩洛哥的经济利益必须受到保护。同年7月7日上午，德皇威廉二世突然决定以游览为名，乘坐邮船“汉堡号”出访丹吉尔。德皇身着戎装，腰佩军刀和手枪，军帽带勒着下颌，完全是一副战地指挥官的装饰打扮。抵达丹吉尔后，受到摩洛哥政府的隆重欢迎。法国代办也到码头欢迎。但威廉二世对他说：“我希望欧洲各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维护它们在这个国家的商业利益。至于我，我决意要使德国的商业利益受人尊重。”说罢，把头猛晃了一下，以示送客，表明他对法国的敌意。然后转向欢迎他的公众，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今天我是向具有独立君主身份的苏丹进行访问。我希望，在苏丹的主权下，一个自由的摩洛哥仍然向一切国家开放，这些国家应在一种绝对平等的立足点和平竞争，不容垄断和不容排他地开展竞争。我访问丹吉尔所抱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我决定做出我的权力所及的一切，来有效地保卫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这一演说假意提出要“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独立，实为要求英法放弃在摩洛哥问题上的勾结，反对法国在摩洛哥取得特殊地位。同年9月1日，德国宰相毕洛夫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向参加 1904年《马德里公约》的各国提出建议 ,要求按照 1904年 12月 10日签订的该公约所规定的一切外国在摩洛哥享有平等的贸易权和其他权利的精神 ,召开国际会议 ,重新调整各国在摩洛哥的地位。并威胁说 ,如果法国拒绝这一建议 ,就有以兵戎相见的危险。这就造成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

1900年普朗克提出热辐射能量的量子化分布理论以后,很少被人注意,就是普朗克本人都一再寻找途径试图推翻这一假说。首先认识到量子假说重要性的是爱因斯坦。1905年1月爱因斯坦发表题为《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的论文,在普朗克的量子假说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光量子假说,认为光可以被看作是能量相互独立的粒子的集合。这些粒子均以光速运动。这些粒子叫做“光量子”(即光子)。当辐射频率为 ν 时,光量子的能量为 $h\nu$ 。利用光量子假说,爱因斯坦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推出了辐射过程中的普朗克公式,求得了固体比热。

爱因斯坦理论与牛顿的光的微粒说有着深刻的区别,在这里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被看作是同一事件的两个不同侧面,即光本身是波粒二象性的。这一理论揭示了微观世界的本质,为人类认识自然界提供了理论依据。

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是对普朗克理论的发展,然而就是普朗克本人亦认为爱因斯坦“太过分”了。直到1905年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完成了他著名的散射实验后,光的量子论才得到确认。

由于这一贡献及在理论物理方面取得的成果,爱因斯坦被授予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